

文学、语言及文化

析唐宋古文家寄游山水的 儒学心迹

——以亭记散文为文本范例

黄仲山

【提要】唐宋古文家写下大量的亭记散文，这些散文记述了古文家寄游山水的经历和闲雅自适的生活状态。然而，由于古文家的儒学思想基础和古文的文体复兴背景，这些亭记散文又或隐或显地体现了古文家的儒学心迹，儒学思想在其中的传达与道禅思想形成一种融通交汇的关系。

【关键词】唐宋古文家 儒学 儒学心迹 亭记散文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3)06-0090-04

唐宋亭记散文的盛兴是附着在当时古文复兴的背景上的，唐宋知名的古文家几乎都有亭记散文存世，成为重要的散文作品集群。而古文运动的发轫以复兴儒学为旗帜，从亭记散文的分析出发，我们可以在古文家论政述贤、阐道释教的文章之外，找出他们从政论学余暇之时寄游山水的儒学心迹，从而更全面地分析儒学思想在古文家文化生活中的存在状态。

一、亭记散文中儒学思想的 依附与传达

亭作为一种观景建筑，游离于宗庙宫观居室之外，咏亭记亭的文字似乎与道家“逍遥游”的思想更为切近，然而通过唐宋亭记散文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儒学思想在其中占据十分明显的地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古文家的儒学倾向使然，另一方面是亭所赋予的文化意义以及亭记的文体功能所致。

首先，唐宋古文家是一批深受儒学思想影响、在政治上也比较活跃的文人，他们以拯济时溺、重振道统为己任，即使在寄游山水时也未尝忘记使命，或者反过来说，儒学在他们思想中的烙印太深，这种主体的思想根

基使得行游坐止无不体现出儒学的印迹，近代学者牟宗三总结说：“儒家主要的就是主体，客体是通过主体而收摄进来的，主体透射到客体而摄客为主。”^①儒家讲究以主体的道德心性来立自然万物的尺度，为外物与内心相互映照的价值判断方式开通理路，其山水“比德”观念就是例证。在亭记散文中的表现就是以儒家仁德观念来发散行文，以亭为意象符号，比附诸如“仁、礼、德、义、孝、廉”等抽象观念，体现古文家首先作为一个儒者的家国观念和道统意识。清代文人沈德潜对欧阳修《丰乐亭记》的一段评论就很能说明问题：“记一亭而由唐及宋，上下数百年之治乱，群雄真主之废兴，一一在目，何等识力？”^②沈德潜对欧阳修大加赞赏，因为在他看来，即便是记亭，也应体现出文人对天下治乱兴废的责任感和对民生的关怀态度。因此，儒学作为深烙在主体内心的一种印迹，在记亭的文章中得到自然的

^①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70~71页。

^② 洪本健编《欧阳修资料汇编》中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38页。

依附。

唐宋古文家用古文来承续儒家的道统，自然有借形式来延续思想的意义，然而，古文复兴的目的不仅仅是用来论政、阐道，还作为一种抒发情感、摹写自然外物的文体，实现了文学性的依附。古文家用古文写下大量记游的文字，亭记散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一方面它不同于政教道统文字，更多地体现文人个人的情感抒写和审美性追求；另一方面，从文体背景和古文家的思想基础来看，亭记散文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儒学思想的种种印迹，儒学思想在其中的传达就是古文家作为文人和儒学信徒双重身份碰撞交织的反映。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描述了观览山水的乐趣，“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①所谓的太守之乐其实还是落实在他对于治绩的自我认可之上，儒家的事功观念在文人醉乐优游中得到了隐性的传达。另外，很多亭记散文记述了文人从严肃的政治生活中脱开，自放于山水之中的愉悦体验，体现了一种理想生活的追求，《中庸》里说：“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总结说：“儒家所要求的理想生活，即在统一这种对立。”“可以说是‘不即不离’”。^②道学家强调道统本位而对古文家“不即不离”的态度提出质疑，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古文家对儒学思想之于人生价值和政治理想的理解与认同方式。如美国学者列文森所言：儒家“‘修身’和‘平天下’必须相互包含”，^③其“内圣外王”之说在他们而言一方面是礼、乐和谐有序的仁治，另一方面还有主体的达道、通理、适情，修身不仅着眼于道德的提升，也在于情感状态的健康和谐。曾巩在《尹公亭记》中说：“内有以得诸己，外有以与人同其好，此所以为先王之道，而异乎百家之说也。”^④这里所说的“得诸己”似乎就包含了情感的愉悦。在亭记散文中，儒学思想的传达结合了文人的山水体验和情感生发过程，体现了儒家文人的一种生活情趣，苏辙《武昌九曲亭记》对此就有阐述：“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⑤这其中所说的“适意”不仅有道家的影子，也可以理解为孔子称道之“曾点之乐”的延伸。

二、亭记散文中儒学思想的几种映照

唐宋亭记散文对于儒学思想的映照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崇仁推礼的儒学基本教义、和乐通达的政教思想和敬贤崇德的人伦道德观念等，概括地说，就是在儒家道统体系内，坚持“内圣外王”的儒家基本价值观。

首先，“仁”、“礼”是儒家思想的根基，在亭记散

文中，对“仁”和“礼”的记述和阐发是从亭的纪念性意义和亭建筑的形构特点为基本点的，王安石在《石门亭记》中借亭的兴废对“仁”做了几种解读：“夫环顾其身无可忧，而忧者必在天下，忧天下亦仁也……始令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则其人之名与石且传而不朽，成仁之名而不夺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⑥纵观王安石生平，其儒家的“外王”思想自不必说，而据余英时先生所论，王安石在古文家中较早具有了“‘内圣’和‘外王’必须兼备的意识。”^⑦这一段对“仁”的阐释就是其“道德性命”的“内圣”之说与鼎革除弊的“外王”思想结合的范例之一。宋张耒在《思淮亭记》中说：“夫弃故而不念，流寓而忘返，则必薄于仁者也。”^⑧从“仁”出发为恋乡思旧的情感寻找依托，把一般的情感问题上升到道统的层面，或许只为自重其论。韩愈《宴喜亭记》则从山水“比德”观念出发来论“仁”：“传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弘中之德，与其所好，可谓协矣。智以谋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仪于天朝也不远矣。”^⑨智以得此山水佳境，仁以在此安居，韩愈列智与仁并用，可谓是对友人之德的最大褒扬。另外，儒家礼制和礼教在亭记散文中也多有表现。荀子认为礼主要是一种“明分”，就是要使社会中“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⑩苏洵在《苏氏族谱亭记》论述了宗族闾里礼节风俗的变化：“既奠，列坐于亭，其老者顾少者而叹曰：是不及见吾乡邻风俗之美矣。”^⑪作者对乡里礼义孝悌等礼制的崩坏提出忧虑，希望能够通过舆论和教化来重建礼教秩序。

儒家知识分子从《乐记》“声音之道与政通”的思

- ① 欧阳修：《欧阳修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7页。
- ② 冯友兰：《哲学的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
- ③ [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 ④ 曾巩：《曾巩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9页。
- ⑤ 苏辙：《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09页。
- ⑥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8页。
- ⑦ 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47页。
- ⑧ 张耒：《张耒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8页。
- ⑨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
- ⑩ 《荀子·礼论》，《诸子集成》第2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1页。
- ⑪ 苏洵：《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页。

路出发,认为建筑也能反映一个时期一个区域政治的盛衰得失,亭的兴废也记述了国运的兴衰。柳宗元曾在多篇亭记散文中反复论述治政与观游的关系,反对将两者对立起来,如《零陵三亭记》:“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愤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①他解释说,治理者能在观游过程中平衡性情,通达事理,从而在处理政事中能够游刃有余。同样,他在《邕州马退山茅亭记》中将政务与闲暇联系起来,使两者构成一种和谐的因果关系:“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日,由是常徘徊此山,以寄胜概。”地方官治理有方,政通人和,如其在《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所说的那样:“盗遁奸革,德惠敷施”,才能有登亭观赏、寄游山水的心情和闲暇。这其实反映了唐宋古文家不同于道家的一种普遍心态,道家将道统刻意强化,而古文家则在坚持道统本体的基础上,不放弃自然性情的表达。人们习惯于将儒家精神归结为入世,道家归结为出世,这其实只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论断,在先秦儒家自身的思想体系里,也有出世精神的某种表达,孔子“吾与点也”其实就是对人的生存价值的另一种依归。儒家治与游的关系,其实是并行不悖的,但同时也要警惕玩物丧志,柳宗元在《零陵三亭记》中也提到:“及其弊也,则以玩替政,以荒去理”,这也是古文家所极力反对的。

钱穆在评述陆象山关于道德学问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时说:“象山只注重在此心之哀与敬,却不注意到墟墓宗庙如何兴起之具体事实上……但没有墟墓宗庙,此哀敬之心,如何兴起,如何着落。”^②虽然只是举的一个例子,但可以就这个话题延伸开来,建筑作为一种实体往往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被赋予某种意义,承载了许多历史人文信息,形成某种文化符号,墟墓宗庙如此,作为观景建筑的亭也是如此,在儒家道德人伦语境下,亭记散文中常常体现着追思前贤的道德理念和化育民风的价值追求。欧阳修在《岷山亭记》中记述了此亭对前贤羊祜的纪念意义,承载了后人的倾慕之意:“余谓君之慕叔子之风,而袭其遗迹,则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③

三、儒学思想体认个体差异的解读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亭通过文学的解读被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意义,其所包含的儒学思想形成具有特定内核而又不失弹性的空间,构成了古文家儒学心迹的

一种隐性传达,既具有某种相一致的思想基础和审美维度,又有作为个体内在精神和情感层面所显现出的独白意义。在亭记散文中,儒学思想的体认受到古文家个性性格理念和境遇心情等种种因素的影响,这一方面在于文人思想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在于其本身意义空间的可塑性及包容性,而这种复杂思想的表露最终也构成了当时古文家整个文化心迹的显像,通过这种差异的解读,我们可以对他们的儒学心迹作更为精微的体会。

在唐宋古文家中,对于儒家道统德性的阐释与维护是程度不同的,儒学思想的印迹也深浅不一,体现了古文家的个体差异。清沈德潜在评述八大家古文时说:“今就八家言之,固多因事立言,因文见道者……然则八家之文,亦醇驳参焉者也。”^④意指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对于儒家道统的依附醇驳不一。有学者对此解释道:“如果说韩愈以道统自许,欧阳修以道德自励,那么柳宗元、苏轼则显然不同……顺应一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将用世进取与避世退隐等量齐观。”^⑤韩、欧、曾巩等人更接近于人们所说的“醇儒”,道禅等思想的渗入相对较少,因此思想更类似于儒家所谓的“醇正”,对儒学道统的维护更为坚定;柳宗元、苏氏兄弟的思想则比较驳杂,在儒学的基本认同之外,许多方面还兼用道禅来排解心绪,体悟人生。

因此,儒学思想在亭记散文中的表现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儒家内圣外王、仁义礼智等理念在亭记散文中的体现有时是直白显露的,唐古文运动先驱贾至在《沔州秋兴亭记》中将亭的建筑特点直接比附儒家道德观念:“观其前户后牖开阖之义,简也;上栋下宇无雕斫之希,俭也,简近于智,俭近于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⑥在这里,亭的形制直接成为仁德智性的象征性表达;曾巩《清心亭记》:“今梅君之为是亭,曰不敢以为游观之美,盖所以推本为治之意,而且将清心于此,其所存者,亦可谓能知其要矣。”这里是说作亭是为清心于此,而不是作为游观遣兴之用,而清心即为儒家所谓“修身”:“斋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则君子欲

① 柳宗元:《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7页。

② 钱穆:《象山龙川水心》,《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8年版,第265~266页。

③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282页。

④ 洪本健编《欧阳修资料汇编》中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33页。

⑤ 沙红兵:《对唐宋古文家的双重批评标准——从韩柳欧苏的妓妾声色谈起》,《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⑥ 《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348页。

修其身，治其国家者，可知矣。”^①另外，如王安石《石门亭记》、韩愈《燕喜亭记》等，都有儒家仁德事功等观念的直接表述。另一方面，苏轼、苏辙甚而是柳宗元等，他们的亭记散文则多自然心性、情感的表达，对亭的意象建构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儒道禅甚至屈骚思想的影响，儒学思想多数作为其寄游山水、抒发情感的一种间接性流露。苏辙在《黄州快哉亭记》说：“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②不以物伤性，求内心的自适，体现了他作为儒家文人对人生价值和生存方式的理解。苏轼更是兼有儒道佛三家思想而能融会贯通的文人，李泽厚评论为“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③苏轼在《墨妙亭记》中说：“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④表达了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世精神和责任感；在《放鹤亭记》中，他又作如下的分析：“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入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把治国者的责任与隐士的洒脱分开，指出清远闲放的人生态度在山林遁世之士那里是一种超脱的境界，而在治国者那里则是荒淫误国，这表明苏轼对出世与入世有非常精辟的认识，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在《灵璧张氏园亭记》中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这反映了他对两种人生选择的理解，仕则忘身，要有心系天下的责任感，不仕则彻底忘却世事，不能首鼠两端，身在庙堂而心系山林，或身在山林而牵念庙堂，惟其如此，才能在进退之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然而并非人人都能有如此的识见与超脱心态，这篇亭记竟成为“乌台诗案”中苏轼的罪状之一，“国子博士李宜之状……是教天下之人必无进之

心，以乱取士之法。”^⑤很显然，罗织罪名之人识见和境界与苏轼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苏轼能够做到“以道家精神来从事儒家的业绩”，^⑥不仅在于他对道家精神的透彻领悟，更在于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因此，在这些古文家的亭记散文中，整体上体现出闲适情趣与事功思想、道学理念的奇妙结合，儒体、道心、禅灵三者共同支撑着其亭记散文的思想基础。

综合上文所述，唐宋亭记散文中儒学思想的传达呈现多层面、多角度的特征，与古文运动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同时也受到古文家个人心性遭际与思想的影响。通过这种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儒家文化在历史中某个时期、某个人群中的存在状态，从中抽绎出儒家文化的“常道”，^⑦在对古文的审美性赏析中领悟儒家思想的精髓和生命力。

本文作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 ① 曾巩：《曾巩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6页。
- ② 苏辙：《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12页。
- ③ 李泽厚：《美的历程》，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66页。
- ④ 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4、360、368页。
- ⑤（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 ⑥ 李泽厚：《华夏美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 ⑦ 李存山：《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

The Confucianism of Ancient Prose Writer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ake Pavilion Proses as Text Example

Huang Zhongshan

Abstract: The ancient prose writer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ad left many pavilion proses, which described their experience of touring landscapes and the elegant lifestyle they pursued.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ir ideological foundation and the background of ancient prose revival, the pavilion proses reflected the spirits and thoughts of Confucianism implicitly or explicitly, which make it quite common that Confucianism blends with the thoughts of Tao and Zen in the proses.

Key words: ancient prose writer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Confucianism; spirits and thoughts of Confucianism; pavilion prose